

慈禧与西安八仙宫

潘存娟

提 要：历史上，上层统治者中的女性推崇道教、优渥道士大都怀有女性特征的心理目的，同时又抱有不同程度的政治目的，对道教的发展也产生过政策导向性的影响。慈禧敕修八仙宫一事既体现了清政府对道教的基本政策，又表现出女性统治者亲近道教的特殊心理诉求。这一方面可视为道教与政治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另一方面也凸显了道教信仰的宗教心理功能。同时，慈禧敕修八仙宫客观上给八仙宫及地方道教产生了积极影响，这是应该肯定的。

潘存娟，女，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2010级博士生，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关键词：慈禧 八仙宫 女性心理

历史上，上层统治者中的女性推崇道教、优渥道士，颇有其事。一般来说，她们都怀有女性特征的心理目的，同时又抱有不同程度的政治目的，对道教的发展也产生过政策导向性的影响。对此，李素平先生在其著作《女神·女丹·女道》中设专章《女主崇道的导向力量》进行了探讨。例如，汉初“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①。再如，隋炀帝的萧皇后“见帝失德，心知不可，不敢厝言，因为《述志赋》以自寄”^②，这篇《述志赋》体现的正是老子无为虚静、戒奢知足的观点。还有唐太宗李世民的徐贤妃也曾以“为政之本，贵在为”的立场劝谏唐太宗爱惜民力，不要大兴土木，“太宗善其言，优赐甚厚”^③。最典型的如武则天，她虽然依靠佛教舆论登上帝位，但基本维持李唐王朝崇道政策，对道教没有进行严重的打击抑制，而且晚年还非常执着于道教^④。唐代公主及贵族女性多有入道之事，也不外乎是为了满足一定的心理诉求和参政愿望。郭武先生的研究也表明，金代章宗的元妃为了“皇嗣”问题优宠全真道士，一度使金章宗改变“禁罢全真”的宗教政策，对早期全真道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⑤。

慈禧是清末实际的女性最高统治者，因为特殊的历史机缘被载入了西安地方道教史册。她只

是与八仙宫这一座道观有过往来，所以长期以来被视为一特例，在中国道教史中，并未引起重大的关注。但是笔者相信道教宫观的经历和机遇是道教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能够从一定程度或特定侧面反映出道教本身的实际情况。所以特例也是有研究价值的。故本文欲以慈禧颁银敕修“万寿八仙宫”这一事件为中心，谈一些看法，以就教于大方。

一、慈禧与八仙宫的历史缘会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是中国农历庚子年。西方列强借口义和团运动向清政府施加压力，慈禧太后被迫宣战，但连打败仗，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史称“庚子国变”。慈禧带着光绪一路西逃，美其名曰“西狩”或“西幸”。“（光绪）二十六年……拳匪肇乱，八国联军入京，两宫西狩。”^⑥西狩最初并没有既定的目的地，先至太原，最终落脚在西安。“联军既占北京，分兵追驾，至保定而还。太后闻洋兵将追至，甚皇惧。江苏巡抚鹿传霖以勤王兵至，及于太原。入谒，言太原不可居，西安险固，僻在西陲，洋兵不易至，乃定入陕之策。”^⑦在西安的几个月里，两宫先后住在当时的总督行台和抚台衙门，“行宫先驻南院，后移北院。南院是总督行台，北院是抚台衙门”^⑧。慈禧即于此时与八仙宫结缘，并在

八仙宫留下了一些遗迹。

初到西安,慈禧就正式接见了八仙宫当时的监院李宗阳。李宗阳曾拜师高仁侗。高仁侗是北京白云观当时的方丈,他与太监李莲英关系深厚,故而与清廷联系密切。李宗阳大概是由于这个关系而被引荐给慈禧的。李宗阳被接见后,曾赋诗记事,诗后记道:“(慈禧太后)召见对奏称旨,赐御书‘玉清至道’,玉冠紫袍。”^⑨这个御书“玉清至道”匾额,原物幸存,现悬挂于八仙宫邱祖殿前。

后来,慈禧便常往八仙宫拈香、赏花,兴之所至,便加赏赐。八仙宫“文革”前还保留有“洞天云笈”、“宝篆仙传”两块匾额、一幅牡丹中堂、两挺御棍,均为慈禧或光绪赏赐。两块匾额分别为慈禧、光绪所题^⑩。牡丹中堂为慈禧所画,并有题诗曰:“国色从来比西子,天香原不借东风。”史载,八仙宫“右,池亭竹木最胜,又绿牡丹一丛,花时行在内侍剪以供御”^⑪。据八仙宫道长们口传,慈禧本来就非常喜爱牡丹,曾专门学画牡丹。她见了这稀有的品种,更是欢喜,所以留下了这幅画。那两挺御棍是慈禧赐予八仙宫保护庙产所倚仗的皇权象征,给八仙宫带来过无上的荣耀,但也被滥用过。以上这些文物皆毁于“文革”,只有“洞天云笈”、“宝篆仙传”两块匾额存有仿制品,现悬挂于八仙殿前。

慈禧回京是在第二年(1901),“八月二十四日辰刻,两宫圣驾自西安行宫启跸。……曲折穿行大街中,辰牌向尽,始出南门。……出城后仍绕赴东关,诣八仙庵拈香进膳。……然千年以来,当无有今日之热闹者”^⑫。本来从抚台衙门向东直出东门,可省三分之二的路程,但是因为要取“南方旺气向明而治”之义,所以体制规定必从南门出。慈禧出南门后仍绕道东关,把八仙宫作为离开西安前的最后一站。就在这“回銮暂憩”之时,慈禧听从内务府大臣继禄的请求,“颁内帑银一千两建修山门,又给建坊银一千两”^⑬,发给李宗阳。八仙宫内碑刻亦载有此事。另外,李宗阳通过陕西巡抚升允上奏恳请慈禧特赐“敕修万寿八仙宫”字样,得到批准。1906年,“山门告成,遣派陕西左翼副都统克蒙额致祭”^⑭。八仙宫之前名为八仙庵,现在民间仍如此称呼。八仙宫之称,即源于慈禧的这次敕修。此后,李宗阳还曾奉旨开坛传戒。

二、慈禧优渥八仙宫的原因探析

慈禧优渥八仙宫,虽是特例,但通过分析仍

能看出,她的行为举措一方面体现了清政府对道教的一贯政策,一方面则体现了女性宗教心理特征对她的影响。

1. 慈禧优渥八仙宫的政策背景

一般认为,清政府对待道教采取的是抑制政策。实际上,这种抑制不是全方位的,而只限于宫廷与道教的关系。为了利用道教管理其信众,清初统治者对道教首领始终给予相当的礼遇。只是从乾隆开始,之前受封的正一真人的地位一再遭到贬降,至道光元年,清王朝停止天师朝觐,完全终止清王朝与道教的一切联系,道教也就完全失去了政治舞台。清政府切断道教与宫廷的直接关系,为的是避免巫蛊之类惑世诬民。若不是因为庚子国变的特殊历史背景,慈禧也可能和八仙宫永无瓜葛。所以,一般认为,慈禧敕修八仙宫“这种特殊的个别事例,并不能代表统治者对道教进行压制的总方针”^⑮。但礼遇道教首领或重要人物,与个别道观有所往来,其实仍是清政府一贯保持的做法。其目的在于利用民间道教神灵的影响力“继刑政之穷”,也就是利用道教补充法律与政策管理的不足之处。

从慈禧的具体做法来看,正是如此。慈禧优宠八仙宫,与前朝政策是一致的,采取的也是对道教首领或个别重要人物的特殊待遇。她并没有因为受益于八仙宫而对整个道教政策有所调整,也只是就事论事地赏赐八仙宫。同时,这种赏赐还遍及陕西各地、朝中群臣。

慈禧在西安期间,正值陕西大旱,她一面“减膳节用,为民祈福”、“潜祷无间听夕”,并“特命大臣致祭太白山神”,竟真的求得“甘霖滂沛”;一面“先后发帑银二百数十万两,南北漕粮又数十万石,省内外各属均得就食,拯饥全活灾黎逾亿万”^⑯。同时“各处进贡之物,太后命太监开单分赐群臣,毫不吝惜”^⑰。慈禧常常游览的八仙宫也自然被列入赏赐之列。这些赏赐有的是用于赈灾,有的目的在于“答神贶而顺舆情”,明显具有收买民心、笼络官吏的政治策略特征,这与清政府道教政策的基本目的也是一致的。

因此,实际上,慈禧对待八仙宫的态度及种种举措,恰恰体现了清政府基本的道教政策,即总体上或政治上是压制的,但对于民间道教力量又视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待遇。

2. 慈禧优渥八仙宫的心理因素

慈禧对八仙宫的态度虽然不能说明统治者对道教的重视,却体现了女性宗教心理特征对她的

行为举措的影响。在当时的时势下，慈禧虽然处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对白云观有着千丝万缕的依赖关系，但她并不能指望与白云观有密切关系的八仙宫替她分忧解难。目前也没有明显的资料说明八仙宫及李宗阳为慈禧出谋划策，倒是有资料对慈禧当时的心理和情绪状况描述得比较详细。所以慈禧最初驾幸八仙宫未必是出于政治需要，而追求心理安慰确有其事。

庚子国变，作为当时的统治者不可避免地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慈禧更是身心俱苦。

两宫到行在后，太后常有胃痛之疾，不服水土，夜不成寐，辄哭，时命数太监捶背，日夜不休。皇上反比在京时健旺，偶与太监耍戏，亦嬉笑如常；惟圣衷不悦时，辄大骂太监，亦似有所怨恨者。各处进贡之物，太后命太监开单分赐群臣，毫不吝惜。凡各省贡品送到内务府，太后必悲喜交集。^⑮

西安向有两个园，至是大加修葺，召京内名角演剧。太监见太后常哭，辄请老佛爷听戏。太后谓：“你们去听罢！我是断没心肠听戏的！”故宫内并无戏台，两宫及大阿哥实未曾听戏。而行在各员往听戏者则与京城兴致无异，是可叹也。^⑯

太后亟思回銮，然往往无端惊惶。……行在各人皆恃邸相为泰山，望电报如饥似渴。太后曰：“我一日不见京电，便觉无措；然每见一电，喜少惊多，心实胆怯。”^⑰

当在行在时，下诏罪己，……太后每见臣工，恒涕泣引咎。^⑱

可见，当时驻蹕西安的慈禧与光绪皇帝及群臣的心理状况有很大差异。慈禧常常惶惶不可终日，这不仅因为水土不服、胃病缠身，更重要的是她心理上比其他人更加焦虑恐惧，而且深感负疚。她惊慌胆怯，夜不成寐，无心看戏，而光绪皇帝却嬉笑如常，官员们更是及时行乐、兴致无异，这不仅是最高统治者与官吏群臣的心理区别，也不仅是实权势力（慈禧）与争权势力（光绪）的心理区别，也表现出男性心理和女性心理的差异。在同样的不利境况中，女性更倾向于焦虑不安。这时的慈禧尽管大权在握，但在国难当头、权力受威胁之际，权力并不能给她带来安全感，反而更加重了她的紧张情绪。

而在八仙宫，她可以享受到片刻的宁静，拈香祈福、赏花作画、书匾题字，与在衙门里的状态完全不同，尽管是暂时的。宗教心理学认为，

逆境的加剧会使人回想到宗教，而且在同样的心理压力（比如焦虑、恐惧、负疚感）下，女性更趋向于神灵的庇护。在最惶惶不安的时日里，虽然慈禧并不是虔诚的道教信徒，但还是喜欢到八仙宫寻求精神慰藉。这时候对于长期经受精神折磨的慈禧来说，八仙宫就是一座暂时的避风港，神圣超然的宗教环境必然给她带来必要的心理安抚。所以说，慈禧在西安期间对八仙宫的眷顾，与其说是最高统治者在笼络道教、利用道教，莫如说是一个身心俱苦的女性在寻求心灵安慰、精神慰藉。当然，慈禧毕竟不是一般的女性，她的特殊政治身份和手中的特权使她有能力给予八仙宫特别丰厚的回报，这种回报则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色彩，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实际的政治影响。

从本质上看，慈禧主要也是利用了道教外在的政治功能和得益于其内在的心理功能，她敕修八仙宫为的也是“答神祝而顺輿情”^⑲。这一点，与之前的“女主崇道”是相似的。虽然慈禧与道教的关系仅表现在与一两座道观的往来上，具有特殊性，不能算作全面的“崇道”，但也不能完全归于孤立的事件或特例。

三、慈禧优渥八仙宫的积极影响

笔者无意为祸国殃民的慈禧翻案，但慈禧敕修八仙宫的客观后果是不该盲目否认的，这决定慈禧在中国道教史中也应该有一席之地。对慈禧来说，在八仙宫的经历是暂时的，对八仙宫的恩泽也是一时之举措。但八仙宫却因此盛极一时，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从史料看来，慈禧优渥八仙宫至少有以下两方面的积极影响。

第一，完备了八仙宫的建筑格局。

八仙宫是一座在民间发展起来的道观，代有增建；间或有上层统治者关注，时获殊遇。其间八仙宫也曾多历兵灾，但因为道众努力，使其屡废屡兴。

八仙庵在长乐坊，相传宋时有郑生见八仙显化于此，明正德间复显于管氏场圃，因建殿，又雷自庵发，增建雷祖殿于庵前。^⑳

如八仙庵，自宋迄今，开成丛林，原四方道友之公所，非一家子孙之私院。康熙初年，任天然募化重修，栖止大众，厥后忽坠丛林而为私守。嘉庆丙寅，赤脚董清奇复为开修，大振仙宫，留参霞土。^㉑

我朝康熙十四年重修、增建孚佑帝君专祠。^㉒

(同治元年回纥起义,攻东关,)斯庵幸存兵燹之余,……今且一望如砥矣……斯庵乃勾工修葺以复旧观……^⑤

八仙宫就是这样,从一座规模不大的庵院,历经几百年,渐渐扩展而成的。在慈禧之前,它基本上已经具备了较为完整的殿宇体系。慈禧敕修的主要建筑是:山门、牌楼、照壁,虽然都属于附属建筑,但的确是八仙宫历史上有史料记载的最高规格的一次修建,使得八仙宫的建筑体系更为完备,为八仙宫大壮了声势。八仙宫也是从那时起才拥有了“敕修万寿八仙宫”的名称。之后至今,八仙宫基本保持着当时的建筑格局。这笔历史建筑遗产,自然要归功于慈禧。

第二,客观上保护了八仙宫的庙产,一定程度上振奋了当时以八仙宫为中心的道教活动。

据八仙宫道长口传,李宗阳因为庙产屡被地方侵占,即乘慈禧驻蹕八仙宫的机会请求御旨保护。慈禧就“赏赐御棍两挺,以壮道貌。所谓御棍者,打杀人不偿命也”^⑥。显然,御棍是保护庙产的皇权象征。当然,八仙宫也曾滥用此权威,当时陕西布政使樊增祥曾欲上奏朝廷收回御棍,但不知何因没有发出去,所以这两挺御棍一直保留到“文革”前。至道光年间,八仙庵已拥有大量田产,约计730亩。如此众多的庙产,难免不受觊觎。八仙宫历史上就曾经出现过“变丛林为私守”的情况。而慈禧赏赐御棍,显然发挥了不小的保护作用,否则在清末特殊的历史时期,八仙宫很难保持“以胜迹作民气”^⑦的地位。所以御棍对八仙宫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在慈禧敕修山门、牌楼竣工之时,还特派陕西左翼副都统克蒙额前来祭祀,李宗阳也奉旨开坛传戒。众所周知,在全真道,开坛传戒具有非凡的意义。陕西是全真道的发祥地和重要活动地,八仙宫是全真道的一座重要宫观,曾经成为十方丛林,在西安地方道教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以八仙宫、重阳宫、楼观台为中心,全真道的活动几乎没有间断过。李宗阳的开坛传戒,虽然没有更为具体的史料提供详细情况,但以八仙宫为中心的道教活动盛况一时,是可以合理推测的。民国二十七年《重修西京万寿八仙宫碑记》中指出,重修八仙宫的目的是“以胜迹作民气”,重修的意义在于“欲国民顾瞻往迹,复昔日民族之盛,以共弼我不丕基也”^⑧。这也可以证明八仙宫在地方道教史乃至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由

此可见,因为八仙宫长期积淀的文化功能和历史地位,慈禧的一时之举也具有“以胜迹作民气”的作用吧。所以笔者推测,慈禧对八仙宫的优渥,应该是全真道在西安地区发展过程中的一次来自上层的锦上添花,对当时全真道活动客观上产生过一定的振奋作用。

综上所述,慈禧敕修八仙宫一事既体现了清政府对道教的基本政策,又表现出女性统治者亲近道教的特殊心理诉求。这一方面彰显了道教与政治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另一方面也凸显了道教信仰的宗教心理功能。同时,慈禧敕修八仙宫客观上给八仙宫及地方道教产生了积极影响,这是应该肯定的。

(责任编辑:首之)

- ①[汉]司马迁:《史记》卷49《外戚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975页。
- ②[唐]魏征等:《隋书》卷36《列传第一·后妃》,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111页。
- ③[后晋]刘昫:《旧唐书》卷51《列传第一·后妃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169页。
- ④李素平:《女神·女丹·女道》,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330—348页。
- ⑤郭武:《“个人”与“社会”:金章宗元妃与早期全真道》,《和谐发展天下有道——2009 骊山问道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年,第360—370页。
- ⑥赵尔巽等:《清史稿》卷411,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020页。
- ⑦⑧[清]罗淳熙:《庚子国变记》,中国历史研究社编,1946年,第17、19页。
- ⑨⑩⑪⑫⑬⑭《西巡回銮始末记》,中国历史研究社编,1946年,第184、185、185、189、186—187页。
- ⑮八仙宫内《诗碑》。
- ⑯⑰⑱⑲⑳翁怪修,宋联奎纂:《咸宁长安两县续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本,卷7《祠祀考》,第364页。
- ㉑吴永口述,刘治襄笔记:《庚子西狩丛谈》卷4,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 ㉒卿希泰:《中国道教史》第四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19页。
- ㉓八仙宫内《慈禧太后万寿碑》。
- ㉔㉕八仙宫内《陕西巡抚升允奏片碑》。
- ㉖[清]舒其绅修,严长明等纂:《西安府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本,卷62《古迹志下·祠宇》,第3152页。
- ㉗八仙宫内《八仙庵十方丛林碑记》。
- ㉘八仙宫内残碑。
- ㉙李子春:《陕西道教志稿》,未出版。
- ㉚㉛八仙宫内《重修西京万寿八仙宫碑记》。